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1917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幸运儿彼尔

[丹麦]亨利克·彭托皮丹

(191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周永铭 甄建国译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幸运儿彼尔

[丹麦]亨利克·彭托皮丹

(191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周永铭 甄建国译

漓江出版社

LYKKE-PER

Femtende udgave

(3. Tranebogsudgave 1. oplag)

© 1937, 1984 Gyldendalske Boghandel

Nordisk Forlag A/S, Copenhagen

据哥本哈根北欧出版社 1984 年第十五版译出

·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

幸运儿彼尔

[丹麦] 亨利克·彭托皮丹 著

周永铭 甄建国 译

*

漓江出版社 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3 插页 4 字数 520,000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平 1—5000 册
精 1—500

ISBN 7—5407—2207—X/I·1367

定价: 平 28.00 元
精 33.0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丹麦]亨利克·彭托皮丹(1857—1943)
(191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新时期有数的宏伟工程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刘硕良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译介，不自今日始。早在二三十年代，一些获奖作家的作品就介绍到中国来了。我们久已熟知的文学名著，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布登勃洛克一家》等等，都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代表作。不过，以往这些译介都没有特别着眼于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角度，甚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它，而且所介绍的数量有限，大部分获奖作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知晓。

适应改革开放大潮推出的这套壮观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同以往的零散译介。它以系统介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为己任，凡是这个头号国际文学大奖的得主，都要尽量为之单独选出一卷，体裁不限，长短不拘；每卷均有译序和授奖词、答词、生平年表、著作目录，力求给读者提供一个能真实地反映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每一得主的风貌的较好版本。不仅过去译过的获奖作家的若干名著要适当选入本丛书，更要深入地介绍许多尚无译文、尚未在中国展露其庐山真面目的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即使过去已有译介的作品，收入本丛书后，译文作了更新或校订，并增加了前言、附录，其译介的深度和精确度也已胜越于旧译。

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这么一套大

型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呢？当1982年丛书头4种问世时，就有人表示过怀疑。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丛书各卷的陆续推出，随着人们视野的逐步开阔，在经历过从简单否定到一味推崇两个极端之后，对诺贝尔文学奖持客观的有分析的科学态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套丛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已为文学界、新闻出版界和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确认了。但人们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直至现在，仍然有人不很理解：“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资产阶级的吗？不是带有地域和政治偏见的吗？为什么我们要以它为标准来划线呢？……”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丛书的出版意图，回答关心它的同志的疑问，趁丛书加快出版进度、力争两三年出齐九十卷，并采用统一的封面设计，各卷逐步纳入新的外形框架的机会，增写了这篇总序，谈谈这套丛书的缘起和设想，以进一步和广大读者沟通，并就教于各地方家。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9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首次确定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涉足外国文学领域的出版社很快由两三家增加到几十家。1980年冬才挂牌的漓江出版社面对并起的群雄，面对人民文学、上海译文两家最具权威的老牌出版社，感到要在众山夹峙的缝隙中走出一条生路来，非另辟蹊径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推出了以《保尔和薇吉妮》、《白夜》、《巴黎的忧郁》开头的小开本“外国文学名著”系列，也正是基于要自成特色、要开拓新领域、要出一批名著而又少重复以至不重复“人文”、“译文”足印的考虑，当郑克鲁和金子信两位先生1981年联合建议推出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时，我们很快就接受了。

不错，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文学奖的颁发往往会和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诺贝尔文学奖既生发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常常导致人们对艺术作品及其评奖工作的认识上的歧异。大家看到，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评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的得主，一般都众望所归，极少异议，而文学奖就比较麻烦，不时会引

起这样那样的诘责和批评。是不是一有非议就证明评委们评错了呢？恐怕还不能这么看。文学作品的特性本来就容易使它人言言殊，不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有比较统一的、公认的、可以量化的鉴评标准，加之诺贝尔文学奖本身虽以张扬“理想主义”相要求，实际衡量和掌握时却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外人无从得知其内幕详情——即使是评委也不得透露近50年的有关档案，所以，在批评意见和评奖理由之间有时很难径情直遂地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但抛开这些因素不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主观上存在某种局限，有时囿于视野或偏见，以致较次要的作家获奖，更显要得多的作家却名落孙山的情况，是确实有过的。

以地域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到1991年止，中间有7年因战争未授奖，有4年每年授予2位作家，实际得奖作家共有88位（萨特未领奖）。他们分布在5大洲30个国家，而主要集中于欧美，其中法国12人，美国9人，英国8人，瑞典7人，德国6人，意大利5人，西班牙5人，俄苏4人，挪威、丹麦、波兰各3人，爱尔兰、瑞士、智利、希腊各2人，比利时、南斯拉夫、捷克、冰岛、芬兰、以色列、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印度、日本、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墨西哥、澳大利亚等15国各1人。尽管评委会近几年第一次颁奖给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优秀作家，受到舆论的广泛好评，人们仍然觉得还有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杰出作家理应更早更多地进入获奖行列。就拿亚洲来说，获奖作家迄今仅有2位，而北欧却有12位，悬殊如此之大，无论就各地区的文学状况或就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来说，都未必与实际相副。造成这种悬殊显然不单纯是亚洲文学翻译介绍少所能解释得通的。

以作家来说。一方面，托尔斯泰、博尔赫斯这样一些文学大师未能获奖，总使人不免有遗珠之憾（受损害的决不会是这些大师本人），特别是拿他们和某些获奖作家的实际成就与历史作用相比较，更让人难以理解评奖的天平究竟是怎样倾斜的。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作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流亡作家得奖，除了他们文学上的业绩外，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其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不然为什么不授给那些文学成就显然更高而思想比较进步或者比较持中的著名作家呢。

凡此种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缺陷和不足。其实，任何文

学奖的颁发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侧重角度,都受一定的价值观念和取向的制约,不可能十全十美、皆大欢喜。我们无意苛求诺贝尔文学奖,要它绝对公正,完美无缺;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只是要如实地对它加以评价,不盲目地把它看得至高无上,不唯“诺贝尔”马首是瞻,不患“诺贝尔情结”。对任何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家作品在内,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评判。盲目崇拜是最没有出息的。

明乎此,我们还要出版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我想至少有三层考虑:

一、诺贝尔文学奖毕竟奖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优异产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和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许多举世公认的名家,如罗曼·罗兰、法朗士、莫里亚克、纪德、萨特、加缪、奥尼尔、福克纳、海明威、吉卜林、肖伯纳、叶芝、艾略特、贝凯特、托马斯·曼、黑塞、伯尔、肖洛霍夫、皮兰德娄、显克维奇、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马尔克斯、帕斯、塞拉、拉格洛夫、汉姆生、泰戈尔、川端康成、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荣膺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使这项大奖当之无愧地拥有不凡的品位和隆盛的声誉。有些获奖者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不算很大,但在其所在国或所在地区仍然占居重要的位置。至于有些作家获奖时呼声甚高,过后则影响减退,这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正常的。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一些作家如彗星划过天空,不能把光亮久留人间,但这并不排斥他们的价值有朝一日又可能重新得到人们的发现和承认。文学现象纷繁多变,我们很难简单地从获奖者一时声名的盛衰来断定其当年获奖是否允当。

二、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本世纪以来国际上最重要、最持久、最有影响的文学现象之一,它对各国各民族众多作家的吸引力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即使从它有时授奖欠公而引起种种议论也能得证明——证明它为世人为文坛所普遍关注。对于这样一项大奖,这样一种辐射面宽广、渗透力深远的国际文学现象,世界各国都颇为重视,我们中国作为文学大国,理应对它有尽可能如实的客观的了解,理应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它进行科学的审视和独到的评析,如果我们不系统出版其作品,又

有什么根据对它发出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呢！

三、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等于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这个大奖和所有获奖者及其作品。如前所述，获奖的不见得完全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未获奖的并不因此而贬损其价值。我们组编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无非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潮流的促动下，从新的角度多开一扇窗口，对北京、上海已出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和 20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起一点补充配合的作用，丝毫没有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来对外国文学作品划线的意思，当然也就谈不上以它来识鉴和取舍所有外国文学作品了。即从漓江出版社来说，我们在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其他外国文学名著和《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域外诗丛》等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尽管如此，作为新时期我国翻译界出版界一项有数的宏伟工程，《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仍以它新颖的角度、诱人的色彩，受到了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和关注，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全国“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包括了这套丛书。在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1980—1990）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中，这套丛书有 3 种——福克纳卷《我弥留之际》、莫里亚克卷《爱的荒漠》、阿斯图里亚斯卷《玉米人》同获一等奖，占一等奖图书总数 19 种的 15%。许多作家赞扬和购藏这套丛书，一次邮寄数十元、上百元到书店、出版社成批购买的不在少数。历届全国书市和在香港主办的中国书展，都把这套书作为重点陈列的展品。新华社多次用中外文向国内外播发丛书出版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读书》、《世界文学》、《中国翻译》等大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多次介绍这套丛书。唐弢、李文俊、彭燕郊等知名作家都撰写过评论。丛书的影响甚至越过了国界，一些国外人士将这套丛书的发行，视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重视洋为中用、对诺贝尔文学奖持郑重态度的一个标志。瑞典诺贝尔图书馆收藏了丛书精装本，文学奖两位评委会见过丛书主编，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并专程访问了漓江出版社，瑞典驻华大使馆和瑞典有关机构还在提供版本等方面给予了友好的帮助。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利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瑞典皇家

学院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学。

*

*

*

出版大型丛书,通常会有一个庞大的编委会,而编委会真正起作用的未必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不仅在书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开拓,在书稿组织上也希望做点新的尝试:不重名而责实,一切以质量为依据,以实效为依据。

首先确定总的构想和框架: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力求使每一卷成为了解该作家的优良选本并起一定的向导作用。这个总目标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的工作来实现的——

一、篇目: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绝大多数是表彰某一作家的整体创作而不特指其某部作品,译本选目必须从授奖词中提名赞扬的作品和史家公认的作品中挑选,首先侧重其代表性和影响力,保证选目的权威,同时适当顾及篇幅、可读、整体平衡和少与其他译本重复等因素。

二、译文:尽量从原语种较好的版本直接移译,即使是译者寥寥可数的小语种作品仍绝大部分译自第一原著。由于组稿困难,个别需要转译的,或采用原著者自己翻译或认可的译本,或设法以原书进行参校,力求忠于原文,接近原文。译作以新译为主,少数旧译在收入丛书时作了必要的校订。希望较多地保持丛书的新鲜感,并传留一部分已有定评的佳译。

三、前言:务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作家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强调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融入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只要言之有物,决不吝惜篇幅。福克纳卷的译序就长达4万余言,等于一本出色的福克纳导读或研究福克纳的入门小册子。

四、附录:尽量收齐授奖词、答词、重要访谈录和生平年表等有关配件,给读者提供较多的信息,提供据以作出自己评判的原始材料。这部分文字名为附录,实乃凤尾,读者对它的兴趣决不在正文之下,而且不可不读。

我们设想通过这些安排,在各卷有限的篇幅内扩充容量,提高质量,并共同形成特色,树立整体优势,不独使我国首次译介

的作家作品引人注目,即使我国介绍过的作家作品也能显示出新的翻译水平和出版水平,让购置了其他版本的读者仍然会对诺贝尔丛书中的新版本发生兴趣。

总的框架和构想确定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遴选和延请对获奖作家研究有素并能胜任译撰工作的专家来主持各卷译事:提出选目,组织翻译,撰写前言,辑录附件。这些工作有的由主持者一以贯之,有的则由他组织同道合力进行而最后总其成。实践证明,各卷主事人选准了,工作做到家了,整个丛书的质量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值得庆幸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名气和中國知识分子赤诚的事业心使我们顺利地得到了语种齐全、实力强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等地许多专家的大力支持,先后共襄此一盛举的老中青优秀翻译工作者多达 200 余人。像董衡巽、冯亦代、赵少伟、吴劳译海明威,李文俊、陶洁译福克纳,巫宁坤译斯坦贝克,施咸荣译贝凯特,柳鸣九译萨特,罗新璋译纪德,桂裕芳译莫里亚克,林秀清译西蒙,高年生译伯尔,刘习良译阿斯图里亚斯,吕同六译皮兰德娄,力冈译肖洛霍夫,高慧勤译川端康成,李野光译埃利蒂斯,林洪亮译显克维奇,绿原译米沃什,文美惠译吉卜林,杨武能译海泽,郑克鲁译杜伽尔,郭宏安译加缪,章国锋译豪普特曼,王逢振译赛珍珠,吴岳添译法朗士,倪培耕译泰戈尔,邵殿生译索因卡,裘小龙译艾略特,刘星灿译赛费尔特,申慧辉译肖伯纳,黄梅译高尔斯华绥,石琴娥译拉格洛夫,李之义译海顿斯坦姆,林桦译延森,朱炯强译怀特,宋兆霖译贝娄,荒芜、汪义群译奥尼尔,潘庆舲译路易斯……都可说是恰当其人,有些人选甚至是国内再好不过的人选。他们长期研究所译的作家,熟悉其全部作品和风格,了解外界有关的评论,自然最有条件选准篇目、把握译文,也最有条件写出高水平的前言来。

*

*

*

丛书起初是分辑出版的,每辑各书在年代、国家、体裁上稍加搭配并有框架统一的封面,但辑与辑之间年代交叉,封面各异,读者保存和查找感到有些不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邀著

名装帧设计家陶雪华女士统一进行整套丛书的设计,各卷封面统一,书脊上标明获奖年份,便于读者按年代先后排放。平、精装本均有前后环衬、作家肖像和丛书总序、总目,精装本还增加了彩印函套。过去已出的各卷,重印时将统一调整,个别卷为两位作家合出的也将单独分开。预计到1993年,如果还有两位作家获奖,丛书就将恰好排满九十卷,以后新增一位增出一卷,《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项系统工程也就大功告成并能不断增加活力了。

与丛书配合印行的还有正在编辑的《诺贝尔文学奖词典》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回顾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著作以及分类选本等。相信丛书出到八九十卷以至上百卷并有各类相关产品相继问世时,一座座华美的文学殿堂将吸引更多的读者一道跨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的壮丽征程。

衷心感谢译者、读者和社内外同仁的携手合作!

衷心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教!

1991年12月26日

瑞雪天于桂林

· 译本前言 ·

丹麦新现实主义经典之作

周永铭

我们知道丹麦的现代工业发达、农业先进,也知道丹麦闻名全球的诗人与童话大师安徒生,还知道那位在世界文学史上产生过不小影响的批评大师布兰代斯,其他作家也许就知道得较少了。

其实,丹麦的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近代以来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不断涌现,本世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就有三位。本书介绍的亨利克·彭托皮丹(1857—1943),与他的同胞卡尔·吉勒鲁普在1917年最先分享了诺贝尔文学奖金。吉勒鲁普以德文写出的《磨坊血案》等代表作,本丛书作过译介。这里推出的彭托皮丹则是以丹麦文写作的又一位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

19世纪7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在丹麦取得突破性进展,丹麦文坛涌现出一批围绕社会和经济问题进行写作的作家,亨利克·彭托皮丹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亨利克·彭托皮丹 1857 年 7 月 24 日出生于日德兰半岛弗里德利西亚的一个牧师家庭，在拉诺斯市度过童年时期。1873 年于当地的文法学校毕业后，来到哥本哈根的工程技术学院学习。1876 年夏天，他在瑞士旅游途中写下《恋家》这部处女作，并萌发出从事文学创作的欲望。1879 年彭托皮丹因对学校的教学与管理不满而中断学业，前往其兄开办的人民高等学校任自然课教师，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同年他写作的《教会后裔》因内容冒犯教会而被退稿，然而文学创作中的首次挫折未能阻止他的创作热情。1880 年服完兵役后，他继续从事写作，《折断的翅膀》终于在 1881 年发表。1883 年他放弃教学，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彭托皮丹根据自己农村生活的切身体验，对现实生活中的虚伪和不道德进行抨击，对艾斯特罗普政府时期左翼崇尚空谈的做法作了批评，同时也对乡间生活中的丹麦农民自我陶醉的浪漫主义进行了善意的讽刺。

从 90 年代开始，彭托皮丹在继续短篇小说创作的同时，在前后 26 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三部长篇小说《希望之乡》(1891—1895)、《幸运儿彼尔》(1898—1904)和《死亡王国》(1912—1916)，以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丹麦社会发生的全面深刻变化为背景，生动地描写了当时丹麦各阶层人物的心态，提出了宗教、道德、哲学、艺术及丹麦与欧洲大国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尤以自传体小说《幸运儿彼尔》最为成功地反映出丹麦社会在世纪之交所经历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和宗教变革，勾画出丹麦完整的图像。

彭托皮丹所处的年代正值丹麦国运不昌、国力削弱。18 世纪下半叶以后，在欧洲大国纷争中，丹麦先是与俄国结盟，结果

招致英国于 1801 年对丹麦不宣而战，哥本哈根被轰炸，丹麦海军也于 1807 年被英舰队全部击沉于锚地。丹麦转而同法国结盟与英对抗，在拿破仑一世失败后，丹麦被迫将挪威割让给瑞典。1864 年，丹麦宣布将日德兰南部丹德边境地区的石益苏勒格并入丹麦，导致普鲁士、奥地利联合出兵对丹麦发动战争，丹麦战败后被迫签署《维也纳和约》，将石益苏勒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州割让给普、奥，丹麦版图随之减少到历史上最小的地步。与此同时，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丹麦立宪议会于 1848 年颁布宪法，废除君主专制政体，改行君主立宪。至 19 世纪末，丹麦工业迅速发展，农村的村社制为合作社制所取代，农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农牧业生产取得长足进步。政治、经济的变化对人们的思想方法和宗教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彭托皮丹的三部长篇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当时丹麦著名文艺评论家布兰代斯在《19 世纪文学主流》(1872—1890)一书中，敏锐地批评了丹麦文学没有跟上欧洲形势的发展而拘泥于旧日的浪漫主义，出现脱离实际的倾向，局限性越来越大。他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主张“文学应从实际生活中来，应当研究现实生活”，“把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同时，他还抨击丹麦贫弱、暗淡的现实，认为丹麦比欧洲各国要落后 40 年，呼吁在丹麦开展一场“精神革命”。彭托皮丹以他的长篇名作《幸运儿彼尔》积极支持布兰代斯的激进主张，并以布兰代斯为原型，塑造了激进的革命领袖纳坦博士的形象。

小说主人公彼尔出身于牧师世家，自幼便与家庭格格不入，随着年龄增大，他的叛逆性格愈发明显。他不能忍受以祈祷开始和结束一天的生活，更不接受严厉的牧师父亲和病弱的虔诚的

母亲引用《圣经》的教诲。在家乡读完中学后，他终于得以离开家前往哥本哈根的工程技术学院学习，而他的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对世代以从事神职为荣的家庭的挑战。然而他很快便对学院陈旧过时的教学内容与方法不满，私下着手进行改造日德兰半岛运河系统的设计。犹太人伊万·萨洛蒙同情并支持彼尔的工作，彼尔在与这位大批发商的儿子的交往中爱上了他的妹妹娅柯布，希望通过与萨洛蒙家庭的联姻实现自己的计划。在萨洛蒙一家的支持下，彼尔出国深造。然而，家庭的阴影仍在伴随着他，得悉父亲病危，他立即从国外赶回家乡为父亲送终。因为不愿意与操纵市场经济的股票经纪人同流合污，彼尔的工程设计未能实现。同时，因为世界观方面的深刻分歧，彼尔结束了同娅柯布的恋爱关系。在伴送母亲灵柩回故乡的途中，彼尔再次屈服在基督教的教义下。在日德兰半岛宫廷狩猎总管庄园作客期间，彼尔结识了布洛姆贝格牧师的女儿英厄，他们相爱并组成家庭，生儿育女。但是事业的挫折使彼尔的精神始终处于忧郁之中，彼尔不愿意因此影响英厄和子女们的生活，他只身一人来到荒凉的西海岸工作，在孤独中找到了生活的真谛，并在此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幸运儿彼尔》浸透着对基督教社会黑暗面的批判，鲜明地反映出作者反对以宗教愚弄人民的思想。彼尔的牧师父亲为人古板，思想守旧，蔑视世俗的幸福，与镇上人格格不入。在家里，他行为专断，对子女们缺少亲情，生活方式多年不变，气氛令人窒息。后来成为彼尔的岳父的布洛姆贝格牧师，表面看去作风开明，能够接受并容忍新生事物，然而实际上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自己的父亲年老多病，他却不给予任何照顾；为给自己

更换马车，便放风说因为收入太少想调走，让教区的教民们凑钱为他买车，而他连声谢谢都不说；为了让自己的未来女婿的降低地下水位的计划为教民们所接受，他利用布道的机会进行宣传，而对因为困难找上门来的信徒，他却以为他们祈祷的空话把他们打发走。实际上，他只是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别人如何议论上帝他并不在乎，而如何看待他才是最重要的。当彼尔在宫廷狩猎总管夫人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以后，他曾试图影响他的恋人娅柯布，而娅柯布在复信中历数基督教所犯下的罪恶后，要求基督教会对着众人下跪承认自己的所有罪行，表现了作者对基督教会的憎恶。

《幸运儿彼尔》对那个时代丹麦人气质中的落后面提出了批评。书中引用纳坦博士的文章，说在欧洲国家大步前进的同时，丹麦人，特别是丹麦的农民仍然自满自得，丹麦国内生活停滞不前，一切照旧不变，令人以为是到了个昏睡的国度。艺术家们崇尚空谈，画家弗瑞乔夫和诗人保尔·贝格都沉迷于对美的追求中，全然不懂实际需要能够实际行动的人。就连被年轻人视为精神领袖的纳坦博士，对科学的进步也知之甚少。书中多次引用猪倌和山精的故事，说他们虽然坐在王家的宴会桌旁，可是心里想的还是自家的饭菜；虽然向往阳光，可是一见阳光便又缩回到地下的洞穴中。年轻时的彼尔，虽然也有改造山河的雄心壮志，但在屡遭挫折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以一个公路检查员的身份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幸运儿彼尔》对社会的不公正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记者杜林本来不学无术，但因卖身投靠实权人物便平步青云，最后居然当上国会议员。操纵股市的金融投机商本哈特为了击败对手，想利用彼尔的工程设计为自己服务，而他的目的一旦不能得逞便